

[现代文学]

陈铨与尼采

黄怀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关键词:陈铨;战国策派;尼采;尼采学说

摘要:陈铨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尼采研究专家,他不仅直接阐释尼采学说,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尼采思想。陈铨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活动体现出明显的功利化甚至政治化特征,而这缘于他试图借助尼采学说以帮助国人确立“内心的新精神”,即推动“精神革命”的努力。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535(2009)01-102-04

Chen Quan and F. Nietzsche

HUANG Huai-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Key words: Chen Quan; the School of Warring States Strategies; Nietzsche; Nietzsche's philosophy

Abstract: Chen Quan,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experts on Nietzsche's philosophy, interprets directly and converts it into his own writing as well. His acceptance of Nietzsche's characterizes utiliz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Chen's intention that he quotes Nietzsche to help Chinese people create "new internal world", that is, his efforts for all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revolution.

作为“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陈铨(1905-1969)既是中国现代较有影响的戏剧家、小说家,又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与尼采研究专家。他的《中德文学研究》(1936)与《从叔本华到尼采》(1944)堪称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与尼采研究的经典之作。本文将聚焦陈铨接受尼采学说这一文化事件,具体考察陈铨对尼采学说的阐释与书写活动,以辨析他接受尼采学说的特征与传播尼采学说的动机。

一、陈铨的尼采阐释

陈铨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高密度地向国人介绍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的学说。据统计,陈铨专题研究学说的文章共有7篇,依次是:《从叔本华到尼采》(1936)、《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1937)、《尼采的思想》(1940)、《尼采心目中的女性》(1940)、《尼采的政治思想》(1940)、《尼采的道德观念》(1940)与《尼采的无神论》(1941)。后来作者将这些论文(《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除外)汇集成书,以《从叔本华到尼采》为题出版单行本(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他还在文艺批评专著《文学批评的新动向》(1943)中的《尼采的思想的演变》(内容同《尼采的思想》)、《尼采与红楼梦》等章节中讨论过尼采学说。

论文《从叔本华到尼采》是陈铨解读尼采学说的第一份成果,中心内容是讨论尼采学说与叔本华学说之间的关

系,并勾勒尼采学说的大致内容。文章首先指出尼采对叔本华哲学由起初的“最崇拜”到后来的“极端相反”的事实,并认为尼采赞成叔氏哲学,是因为它“根本推翻费力斯特式(Philistoptimismus)的乐观主义,让我们清楚认识人生的本来面目”,而他后来与叔本华唱反调,是因为叔本华“否定人生,想用艺术形而上学或者其他麻醉的方法来逃脱人生”^[1];其次,文章还概括地介绍了尼采各种“新思想”如“求力量的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通译强力意志或权力意志)说、“超人”说等具体内容。

《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是中国学界最早讨论尼采历史观的专文。它集中讨论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Unzeitgemäßen Betrachtungen)第二篇所阐述的历史观。作者认为,尼采将“历史”分为“‘碑铭的’”、“‘古代的’”与“‘批评的’”三种,“‘碑铭的历史’就是将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英雄视为学习的楷模,“‘古代的历史’就是崇拜历史人物与教训,“‘批评的历史’就是对历史持批判态度。”^[2]在指出尼采认为过量的历史知识对人生有“五害”之后,陈铨申明尼采特别看重青年,因为“青年人活泼的生命,有进取的精神,他们才了解为什么尼采要这样激烈反对近代的历史教育”^[3]。

《尼采的思想》一文将尼采思想的演变历程分为“艺术时期”、“科学时期”与“超人时期”三个阶段,并逐一介绍尼采的代表性著作与主要的思想主张。其中,陈铨对尼采“超人”概念的解读值得关注。陈铨认为尼采的“超人”

收稿日期] 2008-11-26

作者简介] 黄怀军(1967-),男,湖南常宁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中外比较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研究。

是指“理想的人物”或“天才”、“人类的领袖”、“社会上的改革家”与“勇敢的战士”^[4]等四种人。总之,陈铨认为尼采的“超人”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杰出人物。

《尼采心目中的女性》是中国现代学界唯一一篇讨论尼采女性观的专文。批评家常常根据尼采“你到女人那儿去吗?不要忘记你的鞭子!”与“一位有学问的女人,一定有点什么生理上的疾病”这两句名言认定尼采是女性仇视者,陈铨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偏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尼采不但不仇恨女性,他尊敬女性,爱好女性”,而在理论上,尼采认为男女各有特长,“男子代表力量,女子代表感情”。^[5]陈铨认为,尼采上述语句仅代表他对当时欧洲“女权运动的先锋”的极端厌恶与“仇视”心理^[6]。

《尼采的政治思想》讨论了尼采的国家观、民主观与战争观。尼采反对“现代国家”,因为它“保护平庸”、“守旧而且“腐化”,与“发展个性”、“前进”与“创造”的“超人社会”“水火不相容”^[7];尼采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认为它们“都是注意群众,要求平等”^[8];尼采极力鼓吹“战争”,因为“广义来说,尼采认为人生宇宙,充满了冲突的原素,社会与个人,外物与内心,内心与内心,无处不是战场,无处不是战争”,“在狭义方面来说”,战争“可以使人类进化”,使“腐败堕落”的国家与文化“消除积弊,发扬光大起来”^[9]。

《尼采的道德观念》首先指出尼采研究道德问题的方法是追根溯源的谱系法,尼采通过这一方法揭示了“道德观念,并没有神圣的来源”而“发生于弱小无能的人”的秘密^[10]。尼采反对当下流行的“奴隶道德”,因为它提倡“怜悯、仁爱、谦让、顾虑”等“违反自然的情操”,而赞同“主人道德”,因为它强调“权力意志的伸张”,提倡“不顾一切的无情和勇敢”,是“真正合乎自然的道德”。^[11]陈铨认为,尼采反对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最大的原因,就是它违反自然,压迫生命的活力”^[12]。

《尼采的无神论》是中国现代学界唯一一篇专门讨论尼采宗教态度的文献。陈铨认为,尼采最大的贡献和特色就是反基督教的彻底性:“一切的宗教,最重要的原素,就是要承认神或者上帝的存在”,而“尼采对于基督教的攻击都是从根本下手,他明白大胆地宣布:上帝已经死了”^[13]。

《尼采与《红楼梦》》是作者运用尼采悲剧哲学来阐发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成果。作者指出《红楼梦》和《萨亚涂师贾》(通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分别是“东方文化的结晶”与“西方思想的反抗”之作,着力辨析两位作者思想认识方面的差异:“曹雪芹和尼采,是人生两个极端”,前者代表“消极解脱的人生”,后者代表“积极精彩的人生”^[14]。文章指出:“尼采绝对乐观绝对肯定的人生态度,拿来同《红楼梦》的理想比较,真像北极和南极的距离”,因为《红楼梦》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摆脱生存意志”。^[15]

通观陈铨对尼采的阐释活动,可以看出他特别关注尼采的两个论题:一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如陈铨反复指出:“尼采发现人类一切最伟大的事业建设的时候,……就是忘记了历史,摆脱了历史上一切束缚的时候”^[16];“为了实现这一个新世界,尼采不惜对一切的传统观念挑战,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7];尼采“凭他超越的眼光,深沉的智识,对于社会上一切制度文化道德宗教,都要重新估定价值”^[18]。二是积极的人生观。如陈铨在《从叔本华到尼采》里反复申明:尼采“是一个积极的哲学家,是一个积极

的人”,“尼采爱人生到了极点”^[19];“尼采对人生的态度,始终是肯定的”^[20]。如此种种,足以看出陈铨对尼采人生哲学的评价之高了。

二、陈铨的尼采书写

作为中国现代较有影响的作家,陈铨创作了《天问》(1928)、《恋爱之冲突》(1929)、《彷徨中的冷静》(1935)、《死灰》(1935)和《狂飙》(1942)等小说与《蓝蝴蝶》(1943)、《无情女》(1943)、《金指环》和《野玫瑰》(1946)等戏剧。这些作品受到尼采学说的影响,体现出了较浓厚的“尼采味”。概括起来,陈铨文学作品中的“尼采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塑造了一批“超人”式英雄形象,二是让作品的主人公充当尼采思想的传声筒。

陈铨曾将尼采的“超人”理解为“天才”、“领袖”、“改革家”与“战士”等四种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陈铨眼中的英雄。陈铨多次申明:“天才就是英雄”,“英雄不仅在武力方面,政治宗教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各方面,创造领导的人,都是英雄”^[21];“英雄就是群众的领袖,就是社会上的先知先觉,出类拔萃的天才”^[22]。陈铨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这类胆魄或毅力非凡的“超人”式英雄。如《天问》中出身低微的药店学徒林云章,为了达到娶到店主女儿的目的,不择手段,终于在除掉她的丈夫之后如愿以偿。再如《恋爱之冲突》描写留美学生陈云舫、刘翠华与黄则凌之间的三角恋,结局是陈云舫循着“我不能得到的女子,别人也不能得到”的准则而在黄、刘二位举行婚礼之际枪杀新郎新娘,然后自杀。林云章、陈云舫不达目的不罢休甚至以死相争的行为,透露出野性、强悍与桀骜,属于“超人”式英雄。

相对而言,陈铨戏剧里的“超人”式英雄更为光彩照人。他们常常践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人生准则,常常从事为民锄奸或刺杀日军将官的间谍工作,为此不惜牺牲生命。《无情女》的主人公是牺牲爱情、以身许国的“无情女”樊秀云。她和沙玉清在大学时是一对恋人,北平沦陷后樊秀云离奇失踪,沙玉清则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后来两人重逢,沙玉清终于弄清樊秀云“玩”失踪的苦衷:她要以身许国,只能做“无情女”,只能断绝与情人的联系。作品以两人设计除掉汉奸与日军顾问而结束。《野玫瑰》的主人公是人称“野玫瑰”的女间谍夏艳华。三年前,她以舞女的身份嫁给了汉奸、北平伪政委会主席王立民,现在,她在自己家里遇见了昔日情人、由南方来北平从事间谍活动的刘云樵。当刘谴责她“素来就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民族”的时候,痛苦至极的夏艳华倾诉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因为同自己的情人结婚,就不能再继续间谍工作,也就再不能为国效力、为民族效力,所以为着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她只好离开刘云樵。最后夏、刘二人决心:“从今以后,我们要同中华民族千万英勇的战士,手携着手,向着民族解放的大目标前进!”与樊秀云一样,夏艳华也是为了民族利益甘愿牺牲个人幸福的“超人”式英雄。

通过林云章、陈云舫、樊秀云、夏艳华等“超人”式英雄与“勇敢的战士”形象,陈铨宣扬了强者意识、民族意识与英雄主义主题。这里姑且不论陈铨的理解是否符合尼采原意,但这些形象的确回荡着尼采“超人”哲学的声音。

陈铨常常借文学创作来阐述“哲理”尤其是“政治哲理”。他所阐述的“政治哲理”主要是经过“消化”与“转化”后的尼采学说,如“强力意志”论、“超人”说等。《狂飙》的主人公之一、辛亥革命的豪杰李铁崖自述出山抗日的原因在于领悟到了尼采“强力意志”哲学的精髓:“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求生存的人,可以作奴隶,只有求权力的人,才可以作英雄。”《无情女》里的汉奸王则宣也是尼采哲理的宣传者。他曾对女儿说:“中国当然前进,日本人也要前进,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要前进。当樊秀云谴责他背叛国家作日本人的走狗时,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是一种陈腐的观念,我们应当超出国家。王氏这些言论暗合陈铨阐述过的尼采国家观。陈铨曾经指出:在尼采看来,“现代的国家,是守旧的,腐化的,超人的社会,是前进的,创造的”^[23]。尼采也的确诅咒过“国家”,如他称钳制人的个性发展的现代国家为“新偶像”,而且断言:“在国家消亡的地方才开始有真正的人。”^[24]《野玫瑰》里的汉奸王立民也传达了尼采的声音。当女儿指责他奉行“极端的个人主义”原则时,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有铁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个天下来。……我要别人服从我,尊重我,我决不要人可怜我”;“一个人人生在世,必须要争取支配的权力,没有权力,生命就毫无意义”;“我是一员战士,我永远不向命运低头!而陈铨曾经指出:尼采反对“怜悯、仁爱、谦让、顾虑”等“违反自然的情操”,赞同“权力意志的伸张,强者行动,弱者服从”,标举“不顾一切的无情和勇敢”。^[25]王氏的说法与尼采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陈铨甚至直接让自己的主人公申述对尼采哲学的迷醉与崇拜。如《死灰》中的萧华亭,留德之初心如“死灰”,在接触尼采著作与思想后精神大振,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作品详细描写了萧氏某天夜里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豁然领悟尼采哲学时的狂热心境:“华亭把书翻开,聚精会神,一气读了十几页,稍为静一点,但是忽然心里好像有一股热血,像潮水一般涌来,他登时心慌意乱,不能自主,他的精神也渐渐变得恍惚了。书上的字,一个个地上下跳跃,刺戟得他神经难受已极……这一回他读懂了,尼采的话,平常他以为很难懂的,此时他觉得没有一点困难,意义像是透明的水晶那样的清楚。……他觉得他不仅了解尼采说话的意义,而且能够亲切地体贴他讲话的情热。……他整整读了半点钟,精神上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快活。”

三、陈铨接受尼采学说的特征

陈铨对尼采学说的阐释与书写活动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对尼采学说的神圣化。前述陈铨对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与人生观的推崇自不必说,即使对尼采备受争议的政治思想也是全盘肯定。如茅盾早在1920年就指出:若单根据政治思想来评判,“尼采诚然是人类中的恶魔,最恐怖的人物”^[26],而陈铨却声称:“尼采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近代政治思想家中,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最贵族的。”^[27]

二是对尼采学说作功利化甚至政治化的解读。陈铨喜欢将尼采的哲学概念作形而下的理解,并将它们与中国现实问题挂钩,或者干脆将它们置换成中国式概念。以他对尼采“超人”的解读为例。尼采的“超人”本指一种理想的人类或理想的人格,并非历史上或现实中的人类,因为

他曾说:“超人”是“我的沉睡在石头里的一个图像,是我的一切图像中最美的图像”^[28]。尼采还将“超人”比喻为“尘世的意义”,能容纳“大侮蔑”的“海洋”,“用火舌舔食万物的”“闪电”以及给人类“注射疫苗”的“疯狂”^[29]。也即是说,“超人”既是现世与生命的肯定者、赞美者,也是具有极强免疫力、净化力的传统反叛者。“超人”以象征形式表明传统的人类形象终究要被颠覆乃至被超越。正如当代德国尼采研究专家彼珀所说:“超人被理解为有活力的结构导致了人类和西方人物典型形象的终结:人类被超越了。”^[30]但陈铨对尼采的“超人”完全作了形而下甚至世俗化的理解。他不仅认为“超人”是“天才”、“人类的领袖”,“社会上的改革家”与“勇敢的战士”;甚至说“超人”乃是“没有道德,没有法律,没有国家”的“伟大的罪犯”,是“人类的主人”,是将人类视作“棋子”的棋坛“国手”。^[31]

陈铨对尼采学说的功利化解读还表现在他热心挖掘尼采学说的“警世”意义。他在《尼采的思想》的结尾写道:“中国处在生存竞争的时代,尼采的哲学,对于我们,是否还有意义,就要看我们是否有鉴别的能力,更要看我们愿意作奴隶,还是愿意作主人,愿意作猴子,还是愿意作人类。因为尼采的著作,根本不是替奴隶猴子写的。”^[32]在陈铨看来,如果想作“主人”、“人类”,就能够而且应该接受尼采哲学,而如果甘愿作“奴隶”或“猴子”,就不会也无能接受尼采哲学。作者显然有借尼采哲学鼓励处在危机中的国人抛弃沉沦、奋勇抗敌的用心。陈铨甚至借尼采思想来美化政治人物,最终完成对尼采学说的政治化解读。如他将“超人”理解为“人类的领袖”,并认为“领袖是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他们智力,既然高于群众,群众必须受他们的指挥,才能够建设伟大的事业”^[33]。这明显有吹捧当局最高执政者的意思。关于这一点,陈铨在小说《狂飙》里似乎说得更明确。孙中山先生逝世,李铁崖设灵堂哭奠,并表示:“我相信,中华民族,运命不绝,一定会有孙中山先生那样的人物出来,重新领导中国民众”,如“蒋介石先生设立的黄埔军校,有崭新的精神。正因为陈铨借尼采学说露骨地吹捧最高执政者,他本人连带尼采学说才会受到左派人士的抨击。

四、陈铨传播尼采学说的如目的

如何理解陈铨介绍与传播尼采学说的动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陈铨因为介绍并“活用”尼采学说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任用与“保护”,同时也因为介绍并“活用”尼采学说受到当时进步思想与文化界的猛烈抨击,如曹和仁称陈铨等战国策派学人为尼采“权力意志论底应声虫”^[34];欧阳凡海称战国策派的文艺观为“法西斯思想的文艺观”^[35]。应该说,因为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活跃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正是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的非常时期,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所凭依的尼采思想被置于政治争端的漩涡之中并受到质疑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回归具体而鲜活的历史境遇,才能真正弄清陈铨等人介绍并“活用”尼采学说的动机。

战国策派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与所需的时代精神概括为“战国”二字。所谓“战”,既是他们称20世纪40年代初期为世界各国争强斗狠、战争不断的“大战国”时代(雷海宗语)或“战国时代的重演”(林同济语),又是指此

时最需要“战”的精神与“力”的意识；所谓“国”，就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战国策派领袖林同济宣称：“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36]基于此，战国策派提出要重造“新文化”。他们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人类文化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动。人类必须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一个能够使人类幸福生活的文化”，“中国旧的文化，不能应付这一个新的局面”，也急需被改造为“新文化”；至于创造“新文化”的基础，战国策派指出：“在这一个工作开展的中间，全世界的思想家，都要‘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37]如前所述，“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正是尼采的主张。这样，尼采学说就成了战国策派创造“新文化”的理论资源。

陈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国人引介尼采学说的。陈铨特别注意从精神层面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提倡精神革命或思想革命，为此，他提出了“内心的新精神”这一概念。在《浮士德精神》（1940）一文中，陈铨明确认为，救亡图存的国人必须舍弃“静”而“保守”的“中国人的精神”，而吸收“动”而“前进”的“浮士德的精神”，采取全新的人生观，“假如中国人不采取这样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的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前途怕也有限。况且缺乏这个内心的新精神，想要搬过西洋外表的一切，终究也搬不过来！”^[38]

那么，如何促进国人“内心的新精神”的确立呢？陈铨扛出了尼采思想这面旗帜。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传播尼采学说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人思想或精神的觉醒。在《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开篇，他申明自己介绍尼采的历史观是为了启发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反思的态度：“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处着现在生存竞争的时代，对于这过去四千多年的历史，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中国的文化，有许多地方，不适合于现代，已经是明显的事实，然而西洋的先知先觉，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也发现了许多的危机，我们对于将来文化的创造，应当取什么态度？在这种地方，我觉得尼采的议论，很可以帮助启发我们的思想。”^[39]在《尼采的道德观念》里，陈铨在阐述尼采的道德学说之后反问道：“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我们还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40]尤其在《尼采与红楼梦》的结尾，陈铨指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戏”，“曹雪芹是主张不唱的，尼采不但主张唱，而且主张唱得异常热闹，异常精彩”，哪一种态度可取呢？陈铨沉郁地写道：“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多数的贤人哲士，一个个抛弃人生，逃卸责任，奴隶牛马的生活，转瞬就要降临。……处着现在的中国，假如我们的心还没有全死，假如我们感觉人生的戏剧，不能不唱，假如我们清楚认识，生命不可消亡，那么《红楼梦》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我们就不能再表示同意”；“文化必须要进步，人类必须要超过，这是六十多年以前，尼采对世界人类的呼声。对于现代的中华民族，这一种呼声太有意义了。尼采的思想，固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他积极的精神，却是我们的对症良药。”^[41]显然，尼采的学说成了陈铨用来批评国人错误的人生观、鼓励国人奋起抗敌的精神武器。

由此可以推断，陈铨向国人介绍与传播尼采学说的主要动机，就是借助尼采学说来确立国人“内心的新精神”，即推动新一轮思想启蒙。即是说，陈铨重视“内心的新精神”的思路与鲁迅早年提倡“立人”，陈独秀强调“伦理的觉悟”等主张乃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 [1] [19] 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载《从叔本华到尼采》，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2、27、79页，第28、34、72页。
- [2] [3] [16] [39] 陈铨：《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载郁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5页，第258页，第241页，第241-242页。
- [4] [32] [33] 陈铨：《尼采的思想》，载《从叔本华到尼采》，前引书，第111-113页，第115页，第112页。
- [5] [6] 陈铨：《尼采心目中的女性》，载《从叔本华到尼采》，前引书，第142页，第144页。
- [7] [8] [9] [17] [23] [27] [31]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载《从叔本华到尼采》，前引书，第118-119页，第122-123页，第128-130页，第116页，第119页，第134页，第118页。
- [10] [11] [12] [18] [25] [40] 陈铨：《尼采的道德观念》，载《从叔本华到尼采》，前引书，第150-151页，第150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0页，第156页。
- [13] 陈铨：《尼采的无神论》，载《从叔本华到尼采》，前引书，第160页。
- [14] [15] [20] [41]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载于润琦编选：《陈铨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381页，第383页，第382页，第384页。
- [21] 陈铨：《论英雄崇拜》，载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 [22]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载《时代之波》，前引书，第316页。
- [24] [28] [29] F.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änden Band 2 Hg von Karl Schlechta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1955, p315, p345, pp280-281.
- [26] 茅盾：《尼采的学说》，载郁元宝编：《尼采在中国》，前引书，第94页。
- [30] (德)彼珀：《动物与超人之维》，李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 [34] 曹和仁：《权力意志的流毒》，载郁元宝编《尼采在中国》，前引书，第323页。
- [35]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策派的文艺”》，载郁元宝编《尼采在中国》，前引书，第342页。
- [36]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载《时代之波》，前引书，第50页。
- [37] 《在丛丛书缘起》，载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前引书，扉页。
- [38] 陈铨：《浮士德精神》，载《时代之波》，前引书，第367页。